

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

朴光星

一、引言

中国社会研究中有一个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得不到主流学界广为关注的领域，那就是跨国移民研究。说他重要是因为，其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国务院侨办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中的60%以上来自华人华侨，其投资总额达3300亿美元¹。中国是世界上侨汇收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2008年3月发表的《2008移民和汇款概况》，2007年中国的侨汇收入达2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又是经济开放度非常高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6.8%²。中国在对外交流中取得的上述成就与本文要探讨的中国的跨国移民有密切的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民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移民与以前的国际移民不同，如果说国际移民具有“落地归根”的迁移属性的话，跨国移民则利用全球化时代的高度流动性和便于联系性，建构着跨越国界的社会网络和生活世界，跨国流动性和联系能力成为主要特征。因此，在对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传统的国际移民。移民活动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化，“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取代“地域主义范式”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视角。“跨国主义”是指“当代移民跨越地理、文化、政治边界建立的，维系与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多重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³。因此，以“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为视角的移民研究不像“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为视角的研究，“地域主义”侧重于关注移民在移居地的生活、适应与发展变化，而“跨国主义”更多地关注移民跨地域建立的社会网络与其对移民群体及活动区域的影响。

在中国国内，一般把跨国人口流动问题定位于“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因为其政治敏感性，在建国后长期没能受到关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开始受到重视。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历史性研究，而一些有关华人华侨社群研究也没能摆脱“地域主义”研究视角的局限。上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移民研究中升温的“跨国主义”视角的移民研究，当时没能广泛地影响中国，进入本世纪以后其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与改革开放后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谓“新华侨”的急剧增加和他们的跨国活动能力空前增强、以及国外华裔学者的研究为主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国内有关。

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仍处在边缘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少和相关研究成果有限两方面，其受重视程度远不及社会实际层面的意义。这与把“跨国主义”理解为消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力量而产生的忧虑有关⁴。但笔者认为，虽然“跨国主义”具有对其消解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对其能力增强的一面，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整合其国内外的资源，不断增强其对外影响和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华裔所起的作用正能证明这一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跨国主义”对民族国家发展能力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其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融入全球化的能力对每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中构建跨国人员网络将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跨

¹ 黄乐枕等. 新华侨, 如何与中国经济一同增长[N]. 中国经济周刊, 2006-9-5.

² 刘铮, 周英峰. 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 世界第四[N]. 中新网, 2008-10-27.

³ See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9;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99, pp. 217-237.

⁴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定居者”和“移民”的区分, 批判一些学者对其世界主义和跨国身份的强调, 论述了因各移民群体对“多元文化”的保持以及亚国民身份的“多重认同”使“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亨廷顿. 再论文明的冲突[J]. 新华文摘, 2003)。亨廷顿对跨国移民的看法是像他的“文明冲突论”一样消极的, 但也引起广泛的影响。

国移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为了推动跨国移民的研究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本文准备对最近几年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视角、领域和观点,以供与同仁商榷。

二、跨国移民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观点

以“跨国主义”为视角的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但多数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最近几年。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跨国移民的特点、认同、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侨乡发展、民间外交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一) 定义与特点

全球化时代随着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活跃与兴起,已有的“华侨华人”概念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些学者试图提出新的概念来界定这一变化。有的学者提出“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的新概念,其中海外华人学者刘宏的论述具有代表性。他把“跨国华人”定义为:“那些在跨国活动中,将其移居地与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¹。刘宏认为,现在有三类“跨国华人”:一是“再次移民者”,即一批从传统的华人移居地(东南亚)迁至发达国家的早期移民,他们在新旧移居地之间形成跨国网络;二是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与大陆重新建立密切联系;三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与国内有较强的多重联系。他指出,这一群体的跨界活动呈现出三种模式,即“哑铃模式”(在海外和中国国内都有事业)、“风筝模式”(在多个国家发展事业的同时和国内保持联系)、“太空人模式”(在多处事业之间来回穿梭)。

有的学者则提出“华人散居者”(Chinese Diaspora)的概念,吴前进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她认为,“跨国民族主义”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跨地域的表现形式,以移民共同体为载体,具有“族群民族主义”(ethnical nationalism)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双重特征。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少数民族群,基于此解决了居住国的政治认同身份,成为华族(ethnic Chinese)之后,其文化认同亦在冷战后时代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力,特别是随着华人新移民在祖国和居住国之间来回穿梭,建构了全球化时代作为移民散居者的行为、关系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华人散居者”。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居住在母国之外的移民个人和群体,其行为方式日益呈现为价值理念多元包容和情感趋向彼此兼顾。在此过程中,通过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远程互动,移民在跨国网络中实现社会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吴前进指出,当代的华人移民与1965年以前的老一辈华人移民不同,所以“华人散居者”的概念不能再囿于旧有的窠臼。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认识华人散居者如何在融入居住国的同时,重新参与想象中的回归运动,并体现其祖国民族主义情怀;也有助于认识他们如何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建构到全球化的动态网络系统中,进而有效地把祖籍地与居住地资源结合起来,实现政治推动、文化交流和价值共享²。

“跨国华人”的概念以跨国联系与互动为切入点,强调跨国社会空间的形成;“华人散居者”的概念则以认同的变化为切入点,强调全球化时代认同领域的变化所带来的华侨华人活动空间和能力的变化。尽管两个概念的观察角度不同,但所指涉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试图说明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生活及活动领域所出现的新变化,即跨国联系和互动能力的增强。这些概念融进了新变化,提升了解释力,为跨国移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二) 关于认同

认同(identity)是移民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华侨华人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围绕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认同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陈国贲提出了“华人世界主义认同”的概念,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华人移民认同表现出的重要特征是“重根”,即同时具有多重认同和多种意识。王苍柏却认为,“华人世界主义”依然没能摆脱出“中心论”和“同一性”的局限,进而提出了“外地域性认同”的概念。按照他的解释,所

¹ 刘宏.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全球视野[M].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215.

² 吴前进. 冷战后华人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J]. 华侨华人研究, 2006(1): 20-21.

谓“外”是指它在各种形式的疆域的限制之外,它不依赖任何地理和国家的实体或者种族和文化的归属,而是依靠在自己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之上。王苍柏指出,“外地域性认同”是与“多维度”和“去中心”的崭新的华人移民模式相对应的新的认同形式¹。

吴前进在她的研究中则指出,跨国移民的根本特点在于认同的多元化状态与和世界主义倾向。一方面,他们“无以为家”,尽管拥有基本的族群价值观和身份意识,但缺少精神的根源感;另一方面,他们“处处为家”,属于世界主义新身份的一群,时时与这个世界的新发展取得协调,保持同步。多元认同和全球意识的框架下,他们穿梭于祖籍国和居住国,为两国的文化交流、科技进步、经贸往来和外交关系等打通方方面面的渠道,从而把本土资源和全球进程连接起来,推进和加强两国之间的互动和互惠。这种互动以本土性为基础。以全球化为归依,丰富和发展了多种文明,实现了人类价值体系的共享和共荣²。

范可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了“跨国主义华人认同”。他指出,华人的跨国主义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对“社会创伤”的内在感受,外在动力则是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所以不能简单的在民族主义框架里解释这种现象。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华人控制了所在国的经济命脉,也出现了跨国资本,经济全球化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他们需要同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商业势力竞争,于是跨国主义华人认同遂应运而生。在异国他乡相似的历史遭遇使他们形成了跨国社区、社团、中华认同——无论它是历史的、国家的、文化的,遂成为一种象征和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的整合中发挥了它的凝聚力³。即华人跨国主义认同是面对全球性竞争的文化认同策略。

曾玲则从认同形态来讨论海外华人社团跨国网络的建立。她提出,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里展开跨国活动并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网络?经过考察她指出,海外华人社团之间存在着一条被称之为“乡谊”或“乡情”的共同文化纽带,那就是对“宗乡文化”的认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全世界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时,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团便运用此种社会历史资源与文化纽带,通过对同种、同宗、同方言或同祖籍地缘关系等的重温与强调,以世界潮人、世界客人等跨越国界及超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来唤醒和凝聚全球华人宗乡社群的群体记忆和认同感,通过宣称和强调这种社群关系来建构了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网络⁴。

陈国贲和吴前进的研究强调了华人认同的多元性和世界主义倾向,而且把它看成强化本土性和全球化互动的条件。王苍柏则强调了认同的“非地域性”,即认同的基础不是地域或国家,而是自己所建构的社会关系。范可的研究也延续这种思路,但他强调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全球性的竞争压力对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即华人跨国主义认同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是顺应全球化的一种文化认同策略。曾玲则强调了“宗乡文化”对华人跨国社会网络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即本土性成了全球化的基础性条件。从上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如何看待“本土性”因素对认同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焦点,有的学者强调“本土性”因素的影响,而有的学者则有意识地淡化其影响。

(三)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跨国移民的重要特征是建构跨越地域的社会网络,并把它转化为社会资本。李明欢通过福建侨乡的研究,提出“侨乡社会资本”的概念。她指出,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其基本载体是侨乡的跨国民间网络,其运作机制是侨乡群体以跨国迁移为依托的互惠原则,而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链接则形成侨乡社会资本不断增值的效益特性⁵。

李明欢也对海外华人社会网络进行了研究。经过对“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运作和功能的考察,她得出了“欧华联合会”的主要功能是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的结论。她认为,随着欧洲华侨华人人口的成倍增加,华人群体的整体实力明显增强,欧洲华侨华人在欧洲及世界华人舞台上均表现出空前主动、积极的姿态,欧洲华人已不再是沉默的群体。从基于宗乡关系的联谊互助到自觉地将松散的跨国网络制度化;从满足于个人或小群体在欧洲谋生立足,到刻意追求华人在欧洲舞台上的群体效应,并成功建立起欧洲华人群体形象的代

¹ 王苍柏. 也谈华人[J]. 读书, 2004(10).

² 吴前进. 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J]. 现代国际关系, 2004(8): 18-24.

³ 范可. “社会创伤”华人认同 - 华人跨国主义[J]. 读书, 2005(1).

⁴ 曾玲. 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J]. 世界民族, 2002(6): 45-55.

⁵ 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的解读: 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6): 38-48.

表一欧华联合会，欧华联合会成立虽然只有短短十年，却从一个特定层面展示了欧洲华人社会的面貌，代表了当今全欧性华人社团追踪时代步伐努力拓展的大趋势¹。吴前进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当代移民的一大特点是族群联系的跨国性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结合。移民群体通过社会网络的建构，实现社会网络的资本化与跨国式的族群互动，并进而形成了移民“跨国社会空间”²。

廖小建则分析了“世界华商网络”建构机制及其意义。他认为，“世界华商网络”是以世界华侨华人的血、地、神、业和文缘等“五缘”华人网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经营关系网络。其中，血缘包括血亲、姻亲等宗亲关系；地缘，就是邻里乡党等同乡关系；神缘，即因同样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关系；业缘，指同行同业生意来往的人际关系；文缘，一般包括同学关系或文化上的联络。五缘观念令人们相互亲近从而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在外部条件或多种压力下，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便先后组成各种组织，诸如各种姓氏的宗亲会、各个地区的同乡会以及寺庙神社、学会、行会、工会、协会等，以互通信息，共同扶持，由此形成不断外延、无处不在的蜘蛛网式的联系网络。“世界华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或社会基础，为各国华商相互联系提供了一个条件或平台³。

康荣平从另一个视角出发，阐述了“全球华人创新网络”的观点。他讲到，20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在中国这个后进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之间的矛盾结构中，演生出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全球华人创新网络”。一方面，它源自中国，与中国有着有机的、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深深地嵌入美国的创新体系，是美国创新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因素。1990 - 1998年间，美国硅谷一共创建了7826家高科技企业，其中有1536家（约占20%）是由华人创办的。另外，从60年代起华人科技工作者还以各种方式成立了许多协会，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科技交流与创新的网络。这些协会的活动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扩大到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华人创新网络的一种载体，互联网的盛行更为这种跨国华人创新网络添加了信息联通之翼⁴。

李明欢的“侨乡社会资本”重点探讨了中国侨乡民间社会通过建立跨国性的民间网络走向发达国家劳动市场的流动机制。李明欢和吴前进也注意到了海外华人通过各种方式组建跨国性社会网络的过程，并由此探讨了他们的“跨国社会空间”。廖小建则从商业网络的角度分析问题，阐述了“世界华商网络”建构机制及意义。康荣平又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了华人科技工作者之间以交流为中心形成的“全球华人创新网络”。可见，华侨华人形成的社会网络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而包含着多元、多重的内容和性质。

（四）跨国网络与侨乡发展

虽然“中国研究”和华人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研究热点，但长期以来，“侨乡现象”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海外华人富豪及其与中国的联系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华人中小企业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华人对其故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合作与支持却多被研究者所忽视。中国侨乡经济的意义远超过自身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水平。侨乡以海外移民为桥梁，发展外向型商贸网络，在资本结构和产业导向方面注重市场化和国际化，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起了示范和导向作用⁵。

庄国土在他的研究中重点考察了近30年来的菲华晋江社团与祖籍地的联系。他谈到，菲华晋江籍社团的变化呈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趋势，菲华的祖籍地情结一方面因本土化趋势而削弱，但其宗亲、同乡纽带却因为社团国际化趋势而加强。这种宗亲与同乡纽带被利用于跨国网络的建构，尤其是发展与祖籍地的关系。晋江籍菲华社团在推动菲华与祖籍地的经贸联系，捐助教育及公益事业方面，起了重要的中介和沟通的作用，为促进祖籍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⁶。

李明欢等人全面地考察了被称为“福建旅欧第一县”的明溪侨乡形成、发展的原因和过程，着重考察了近年来各类出国人员对移出地形成的社会影响。她们谈到，“出国潮”使出国劳务收入成为明溪县经济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并促进了回乡投资和农民视野的拓宽。与

¹ 李明欢. 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J]. 社会学研究, 2002(2): 30-39.

² 吴前进. 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J]. 现代国际关系, 2004(8): 18-24.

³ 廖小建. 世界华商网络的发展与潜力[J]. 世界历史, 2004(3).

⁴ 康荣平. 全球华人创新网络的发展及作用[J]. 研究与探讨, 2004(3).

⁵ 庄国土. 晋江侨乡海外联系研究课题的目的、进程与意义[J]. 南洋问题研究, 1999(1): 11.

⁶ 庄国土. 菲华晋江社团的变化及近30年与祖籍地的联系[J]. 南洋问题研究, 2001(1): 61-72.

此同时，她们也谈到伴随着出国潮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出国人员的身份确认、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对出国打工人员的不客观的评价等问题。她们指出，全球化带来的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是劳动力资源的全球观，当今世界上劳动力跨境流动的规模空前，但与国际大环境相比，中国输出的劳动力显然太少。她们强调，不是堵住人口对外流通的渠道，而是积极化堵为疏，为中国劳动力正常跨境流动提供必要的政策性支持，争取移出与移入地、迁移者个人与群体的共赢效应¹。

郑一省在他的著作中，从历史到现实，从纵向到横向，从经济到文化，多方位、多视角地探讨和分析了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的互动关系。他说到，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快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华侨华人与其家乡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增多，多重网络又开始复兴和活跃起来。这里的多重网络是指一种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多线、多群体、多层面的复杂关系网络。这个时期的多重网络已从区域性的网络转变成全球性的网络，在其中，经贸网络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社团网络、资讯网络也得到了加强。全球性的多重网络使侨乡和华人社会得以运转，通过这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侨乡得以利用社会资本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华侨华人也从侨乡老家那里获取社会资本，使他们在侨乡的投资较快并顺利地取得利润，并加深了他们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²。

蔡苏龙在泉州侨乡研究中，注意到侨乡传统组织重新得到复兴的现象。他谈到，当中国的国门再次被打开的时候，海外宗亲团体纷纷回乡祭祖、寻根，一度蛰伏几近消失的传统组织获得有力的刺激而复苏。侨乡需要对应的家族制度与宗亲组织和海外华侨华人接触联系，于是联族谱，修缮祠堂，让远方的亲人有所依归。本土乡亲通过修复民间社会中的传统组织，也就修复了一条联系海外、获得海外社会资源的渠道。宗族制度对于侨乡社会与海外华侨华人联系的加强，对于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的崛起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³。

虽然每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多数研究主要关注了海外华人与侨乡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侨乡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的互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是否又仅限于积极一面？正常的互动以外有无非正常的互动？目前的侨乡研究中对这类问题的讨论比较少，这说明侨乡研究有待于继续拓展。

（五）民间外交及国家发展

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对某一区域或群体的影响，而已上升到扩大民间外交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高度。各个国家（不管是输出国还是输入国）都开始重视移民，并制定了相应的移民政策，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在跨国移民研究中，有关民间外交与综合国力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类似的研究在中国也开始升温。

吴前进在相关研究中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视点，探讨了以新华侨华人为载体的民间互动如何在积极融入居住国的同时，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发展做出跨国阐述与民间释义。她谈到，在民族国家和跨国主义互为激荡的年代，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直接后果，无疑与国家关系相连，与地区关系相合。民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国家关系的改善、发展，地区关系的整合，奠定了厚实的民间基础。此种，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多元探寻，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和国家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双赢互利的方向。她继而指出，民间关系的友好深入取决于跨国移民的经济成就、文化努力和社会贡献。只有当跨国移民群体在沟通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积极有为的时候，才能够为国家关系的持久深入奠定厚实的民间基础。她谈到，目前除了为数不多的跨国移民个人具有突出成就之外，庞大的跨国移民群体还远没有达到足以在各个领域形成广泛影响的程度⁴。

余万里也关注了全球化时代的民间外交。他谈到，全球化通过时空压缩赋予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能力，政府不再是垄断外交权力的唯一行为者。外交活动的空间在扩展，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政府不得不在众多新角色编织成的网络中寻找内政与外交的平衡，这正体现着民间外交的战略价值。他指出，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暴力打砸抢事件之后，西方社会与某些国家掀起了一轮对中国施加人权压力的高潮，对中国外交构成了严峻的挑

¹ 李明欢等. 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4): 8-15.

² 郑一省.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³ 蔡苏龙. 侨乡社会转型与华侨华人的推动[M]. 天津: 古籍出版社, 2006.

⁴ 吴前进. 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7(2): 7-22.

战。在这个时候，海外华人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集会游行、舆论宣传等方式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奥运的精神¹。

程希则在研究中通过探讨移民的流动性，试图揭示中印（中国与印度）两国海外移民的流动性对两国发展和综合国力所具有的影响。她指出，两国不仅都通过移民获得的资金、技术、商业网络关系等增强了本国的“后发优势”，而且海外移民均以母国历史悠久的文明而自豪，努力保持和传承着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也有利于两国综合国力的增长²。

留美学者彭轲（Frank Pieke）在研究中以“跨国的福建人”为例，就移民的深层意义展开理论探讨。他提出了“跨国华人”与“中国的全球化”的两大概念，并在“中国的全球化”的大框架下，以“跨国的福建人”为例，解读了“跨国华人”的各种涵义。作者指出，从“跨国华人”角度切入对于“中国全球化”的研究，实际上要研究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影响世界，同时还需要探讨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政权、地方政府、中国移民的接受国、海外华人富豪、海外华人社团以及各类中介机构，如何试图从不同层面左右“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他强调，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以及由中国移民带往各地的“中国文化”相互交织，越来越鲜明的彰显着“中国特色的全球化”³。

吴前进把跨国移民看成为国家关系的持久深入奠定厚实基础的角色，余万里则把他看成外交的多元主体之一，并称其价值越来越重要。程希则通过探讨移民的流动性，试图揭示移民活动对综合国力影响；彭轲的目标更大，他把“跨国华人”与“中国的全球化”联系起来，强调跨国移民是去建构中国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上述研究表明，移民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微观或中观层次，而上升为发展民间外交、提高综合国力与促进国家对外影响的战略高度。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跨国移民的增多，其重视程度会不断提高，这说明跨国移民研究将有更广阔的空间。

三、结语

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很快，出现了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和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中国国内的吴前进、庄国土、李明欢、郑一省和旅居国外的刘宏、彭轲、项飏等人的研究推进了跨国移民的研究，使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国际水平。但目前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一是依据详实的实证资料为基础的研究仍为少数，理论探讨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研究居多，这对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是不利的。其次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沿海传统侨乡和以此为故土的华侨华人群体，未能扩大到广阔的内陆地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跨国移民已不局限在沿海地区，很多内陆地区的人们也开始走向国外，并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需要关注跨境少数民族的跨国互动及其影响，中国有30多个跨境少数民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互动定会增强，对国家的影响也会增多，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三是对来到中国的外国移民的研究甚少，可以说还是一片空白。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他们在中国如何适应、发展，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国际交流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都需要做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这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并加快发展。总之，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有待于提高质量、扩大范围。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¹ 余万里. 全球化时代的民间外交[J]. 国际观察, 2008 (5): 32-36.

² 程希. 从比较的视角看海外移民的流动性对中国的影响[J]. 南洋问题研究, 2007 (1): 64-73.

³ Pieke, Frank, Pal Nyiri, Mette Thuno and Antonella Ceccagno, “*Transnational Chinese: Fujianese Migrants i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年.